

比较

NO.2, 2015

77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青木昌彦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

李波 伍戈 席钰

论“结构性”货币政策

蒂莫西·贝斯利 托尔斯滕·佩尔松

为何发展中国家征收那么少的税？

亨利克·克莱文

为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征收那么多的税？

路易吉·津加莱斯

美式资本主义的蜕变

安德鲁·霍尔丹

管理全球金融

S. 安德里安诺娃 P. 德梅特里亚兹 许成钢

欧洲和亚洲金融市场的政治经济渊源

越泽明

从日本的经验看中国城市化和京津冀一体化

许宪春

第三次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修订

姜斯栋 崔鹤鸣 王小鲁

山西省永济市蒲韩农协调研报告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比较

No.2, 2015

C O M P A R A T I V E S T U D I E S

77

吴敬琏 主编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第 77 辑 / 吴敬琏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86-5081-4

I. 比… II. 吴… III. ①比较经济学 IV. ① F06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3651 号

比较·第七十七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5081-4/F · 334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96-0110

<http://www.caixin.com>

010-58103380

E-mail: service@caixin.com

卷首语

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现实，新常态下既得利益固化，传统思维方式和投资饥渴症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凝聚改革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更大了。究竟应该如何应对？从理论和国际经验来说，对于已经处于世界经济中增量第一、总量第二位置的我们，都需要顶住压力，坚定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使得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这才是经济再平衡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辑《比较》的文章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主旨。

开篇青木昌彦的文章《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运用比较经济学方法，从供给面分析哪些因素决定或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比较分析，青木昌彦指出，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未来不再能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是新常态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也是成功发展的结果。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源泉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同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创新组合，而这样的创新离不开职业经理人的领导作用，以及市场导向和遵守规则的公司治理制度的支持。他认为，走向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以在这个方向探索出关键的路径；通过恰当的改革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可以使经济增长成果得到更公平的分享。就此而言，社会保障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将成为应对新常态时代的重要战略补充。

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也被寄予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厚望。中国人民银行李波等人的《论“结构性”货币政策》一文结合国际经验，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成因与效果。他们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诸多挑战，短期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根据各自特点，协调配合，为结构性改革赢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各种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应该与国内金融发展和经济结构改革相结合。只有通过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面对经济的新常态，中国新领导集体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特稿”栏目的两篇文章从税收角度讨论与国家治理能力相关的一些问题，

也许有启发意义。伦敦经济学院的蒂莫西·贝斯利教授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托尔斯滕·佩尔松教授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征税偏低。从他们的分析来看,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一个国家如果政治上缺乏制衡和竞争,政府对产权保护不力,合同得不到有效执行,而且腐败盛行,就无法增强企业在正规经济下运作的吸引力和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识,也就无法增加税收。而这些导致低税收的因素恰好也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伦敦经济学院的亨利克·克莱文教授则分析了丹麦、挪威和瑞典这三个北欧国家为什么能够征收高额税收来实现再分配,与此同时并没有严重地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他认为,使用发达的信息跟踪来促进税收遵从,使用宽税基来限制合法避税的范围,对工作互补品提供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挪威的纳维亚的高税收之谜。

“美式资本主义的蜕变”一文是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美国金融学会新任会长路易吉·津加莱斯的新书《人民的资本主义:重拾美国繁荣的精神》的导言。坚持自由市场、鼓励竞争、限制大公司政治影响力的美式资本主义曾经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统的美式资本主义正在蜕变,政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企业通过俘获政府直接榨取资源,通过俘获专家和游说集团来决定政治议题,控制思想论坛,由此损害了民众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信任和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这种蜕变的鲜明例证。美国如要避免陷入南欧式裙带资本主义或南美式长期衰落的境地,必须重拾美国繁荣的精神,通过透明的数据信息、有力的法律保护以及倡导良好的社会习俗来重塑竞争的力量,而非诉诸增强政府的影响力。

“前沿”栏目是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的文章《管理全球金融》。霍尔丹回顾说,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30年间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经历了惊人的变化,已从东拼西凑的杂烩演变为一个相互联系、紧密交织同时又乱成一团的真正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如同其他紧密联系的网络一样,兼具稳定性和脆弱性的双重特点,并受到强有力且日益增强的溢出效应和全球共同因子的驱动。因此必须以系统化的视角来理解和管理全球金融体系。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包括改进对私人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加强公共部门融资机制的建设等。

许成钢等人从历史角度考察欧洲和亚洲一些最成功的金融市场,探寻其中的政治经济渊源。他们从伦敦、阿姆斯特丹和中国香港的历史经验中发现,在金融发展起步阶段,政府通过垄断和保护性措施推动了金融的发展。但是,这种垄断和保护性措施的推动作用必须以强有力的产权保护为前提,而且当金融发展到一定临界点时,降低进入壁垒,增加竞争,开放准入,才会有利于金融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向前推进,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与挑战,《比较》借日本城市化专家越泽明教授来京之际,就城市化和京津冀一

体化发展做了专访。越泽教授认为，在京津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应急住宅问题，交通网问题，大气与水污染问题，工业、商业与居住区的梳理等问题都是发达国家在大城市急剧发展中出现的共通问题，然而就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各国的对策不尽相同。越泽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城镇化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如果能够吸收海外经验，仍有较大改善余地。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建立了定期开展全国经济普查的制度，普查范围为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经济活动。同时，利用经济普查获得的更加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进行系统的修订也已经形成惯例。许宪春的文章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了第三次经济普查年度 GDP 核算修订的具体情况，不仅包括资料来源和相应计算方法的修订，而且包括基本分类的修订。对于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实施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小鲁等人的文章是对山西省永济市蒲韩农协的调研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农协在联合分散的农户、促进农业技术推广、推动农业产业的规模化、改善农村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在维护家庭为农业主要经营方式的基础上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应该是占主流地位的农业组织方式，是综合性地解决三农问题各主要方面的可行方向。因此对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意义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不应简单以综合性农合组织可能与原有政权系统发生冲突而限制综合性农合组织的发展，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扼杀农合组织。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主管 中信集团

主办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 吴敬琏

副主编 肖梦 吴素萍

编辑部主任 孟凡玲

编辑 包敏丹

封面设计 李晓军 / 美编 杨爱华

经营部

总经理 吴传晖 (兼)

常务副总经理 张翔

总经理助理 汪弘彬

市场总监 戈悦

发行总监 邱道姗

设计总监 石乐凯

品牌传播总监 马玲

独家代理：财新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8610) 85905000 传真：(8610) 85905288

广告热线：(8610) 85905088 85905099 传真：(8610) 85905101

电邮：ad@caixin.com

订阅及客服热线：400-696-0110 (8610) 58103380 传真：(8610) 85905190

香港地区订阅热线：(00852) 21726522

订阅电邮：circ@caixin.com 客服电邮：service@caixin.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8号院三里屯 SOHO 6 号楼5层 (邮编：100027)

目 录

Contents

第七十七辑

- 1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 青木昌彦
A Comparative Economic Account of China's New Normal
by Masahiko Aoki
- 11 论“结构性”货币政策 李波 伍戈 席钰
On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by Bo Li, Ge Wu and Yu Xi*

特稿

Special Feature

- 26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税收那么少?
蒂莫西·贝斯利 托尔斯滕·佩尔松
Why Do Developing Countries Tax So Little?
by Timothy Besley and Torsten Persson

- 46 为何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征收那么多的税? 亨利克·克莱文

How Can Scandinavians Tax So Much?

by Henrik Jacobsen Kleven

新书架

New Books

- 70 美式资本主义的蜕变 路易吉·津加莱斯

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 Recapturing the Lost Genius of

American Prosperity

by Luigi Zingales

前沿

Guide

- 80 管理全球金融：系统性的视角 安德鲁·霍尔丹

Managing Global Finance as A System

by Andrew Haldane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102 欧洲和亚洲金融市场的政治经济渊源

S. 安德里安诺娃 P. 德梅特里亚兹 许成钢

Political Economy Origins of Financial Markets in Europe and Asia

by Svetlana Andrianova, Panicos Demetriades and Chenggang Xu

城市化

Urbanization

- 130 从日本的经验看中国城市化和京津冀一体化

越泽明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Lessons from Japan

by Akira Koshizawa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140 关于第三次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修订

许宪春

China's GDP Accounting in the Third Economic Census Year

by Xianchun Xu

- 164 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

山西省永济市蒲韩农协调研报告 姜斯栋 崔鹤鸣 王小鲁

Comprehensive Farmer Cooperatives towards Modern Agriculture:

A Case Study on Pu-Han Farmer Associ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by Sidong Jiang, Heming Cui and Xiaolu Wang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

青木昌彦

官方目前已确认，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35 年高增长后已进入新常态时代。新常态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主要的不同特征？本文试图从经济和人口的背景及条件对此展开分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的 GDP（以当前价格计）在 2009 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来测算实际 GDP，中国的经济增长成绩将更为惊人。2013 年的实际 GDP 达 16.149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日本的 3.5 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尽管在人均 GDP 水平上，中国依然落后日本约 70%，但根据我利用中国省级数据进行的估算，沿海地区的人均 GDP 已达 13449 美元，仅落后日本约 60%（参见图 2）。以上的粗略观察带来了若干有趣问题：按实际人均 GDP 计算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与过去相当的高增长率？如果不能，有哪些因素在决定和影响新常态下的增长机遇？其他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人均 GDP 增长的供给来源：初步的比较统计分析

首先来做个简化计算，把人均 GDP 增长率分解为不同的供给来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增长潜力的公共政策讨论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资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费——俗称的“三驾马车”。然而对长期增长潜力的评

* 本文提交给 2015 年 3 月 21—23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估却离不开供给面的因素。中国在 2008—2012 年年均 8.62% 的人均 GDP 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来源：

- 工作年龄人口（15—64 岁）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对人均 GDP 增速的贡献约为 0.46%；
-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增加），给人均 GDP 增速带来的负面影响约为 -0.57%；
- 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A 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U 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贡献值约为 3.11%；
- 部门工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贡献值约为 5.46%。

为了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成绩，图 1 展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均 GDP 增长轨迹及其供给面增长源的分解结果（借助各个国家的官方数据）。^①对三国的柱状分解图进行比较，我们能立刻得出如下几个印象：

（1）库兹涅茨效应是三个国家高增长时期普遍发生的现象：日本（1955—1970 年），韩国（1970—1990 年），中国（1982—1987 年，2000—2012 年）。^②

（2）在三个国家的高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也普遍存在。不过这个效应在逐渐减弱，日本在 1990 年后甚至最终出现负效应。

（3）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人均收入增速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取决于下面将讨论的若干社会因素。

① 分解的计算过程如下： $Y = \text{GDP}$ ， $N = \text{人口规模}$ ， $L = \text{工作年龄段人群的规模}$ ， $E = \text{总就业人数}$ ， $Y_i = i \text{ 部门的产值}$ ， $E_i = i \text{ 部门的就业}$ ，其中 $i = A \text{ 或者 } U$ ，因此有： $Y = Y_A + Y_U$ ， $E = E_A + E_U$ ， $y = Y/N = (L/N) (E/L) [E_A/E \times Y_A/E_A + E_U/E \times Y_U/E_U] = (L/N) \times (E/L) \times [1 - \alpha\Delta] \times (Y_U/E_U)$ ，其中 $\alpha = E_A/E$ ， $\Delta = [1 - (Y_A/E_A) / (Y_U/E_U)]$ 。以 $g(\cdot)$ 代表各变量的增长率， $g(y) = g(L/N) + g(E/L) + g(K) + g(Y_U/E_U)$ ，其中人均 GDP 增长率 $g(y)$ 分解为： $g(L/N) = \text{人口红利}$ ， $g(E/L) = \text{劳动参与率变化}$ ， $g(1 - \alpha\Delta) = \text{库兹涅茨效应}$ ， $g(Y_U/E_U) = U \text{ 部门的人均生产率}$ ，最后这项可进一步分解为： $g(Y_U/E_U) = [1/(1 - \theta_U)] g(TFP_U) + [\theta_U/(1 - \theta_U)] g(K_U/Y_U)$ ，其中 $\theta_U = \text{资本所占份额}$ ， $K_U/Y_U = U \text{ 部门的资本产出比}$ 。

② 然而，这至少可能部分源于官方就业数据没有准确反映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的实际规模。图 1 所反映的测算基于三个国家的官方统计数据，农业部门等同于第一产业，城市部门包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 1990 年后的中国例外，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就业人数分别以农村和城市就业人数来代表，该指标对于测算库兹涅茨效应或许更为准确。

(4) 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减弱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历程,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潜力将主要依赖城市部门的人均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二、哪些供给因素决定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图1所包含的是从国别比较和历史背景得出的信息,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各种供给因素对新常态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1) 库兹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

历史上的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z)观察到,农业部门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中的长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这一实证研究结论背后,是他对当时还极为缺乏的历史和国际比较数据的艰苦的收集分析工作。根据他的发现,法国用了60年时间(1880—1950年)才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2%到33%),德国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42%到29%),美国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0%到31%)等。^①除19世纪早期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减少过程都是相当缓慢而长期的。相反,图2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这一过程被压缩到更短时期完成。中国沿海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7个百分点(从50.0%到23%),内陆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68%到43%)。1990年,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比农业部门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规模和快速的库兹涅茨效应成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极为显著的促进因素。

从图2中还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结论,可能与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有关。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分别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约

^① 参见 S. Kuznetz,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Supplement (1957), 表14。还有篇有趣的论文, Gatti, Gallegatti, Greenwald, Russo and Stiglitz, “Sectorial imbalances and long-run crises” (in F. Allen et al, eds. *The Global Macro Economic and Finance*, IEA Conference Volume No. 150-III, Palgrave Macmillan), 认为美国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金融业,而是库兹涅茨过程的中断,美国经济的复苏也是依靠库兹涅茨过程的重启。

20%，同高速增长时期结束的时点基本吻合。在 20% 的分界线之后，两个国家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变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农村家庭的子女上学而进入城市部门。两国的农业都主要依靠人数逐渐减少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由政府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提供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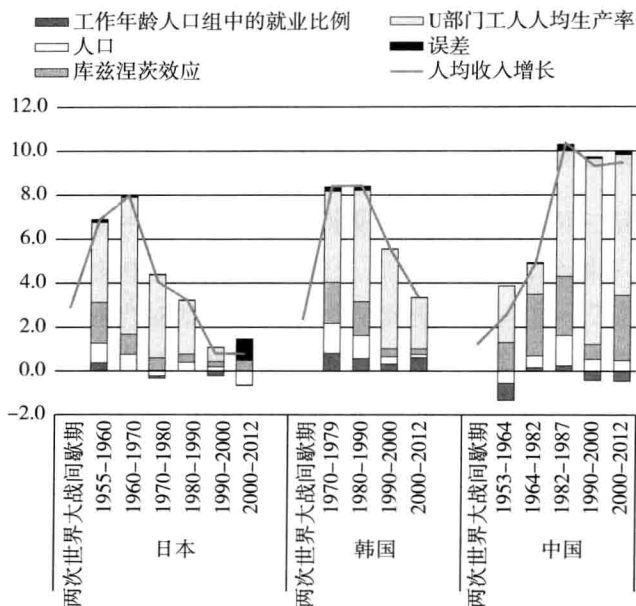


图1 中日韩三国人均 GDP 增长率的供给来源分解

资料来源：根据官方的部门就业和产值数据，以及注释中解释的人口数据进行测算。^① 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人均 GDP 数据估算来自：日本（1911—1940）：K. Ohkawa and H. Rosovsky (1973),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Trend Accele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韩国（1911—1940）：M. S. Cha and N. N. Kim (2012), 'Korea's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11—40', *Extrapol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49; 中国（1914/18—1931/36）：T. G. Rawski, (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有趣的是，Rawski 的研究和近期的其他研究认为中国在两次大战间歇期实现了人均 GDP 正增长，不同于经常被引用的 Maddison 所做的零增长估计

① 在计算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率时，没有考虑 1989—1990 年，因为官方的就业数据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导致新旧两种方法估计的就业数量出现了 7200 万人的差异。类似的，韩国的部门产出，只有以 1970 年和 1979 年之间的要素成本计算的广泛数据，以及此后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官方数据。因此，不包括 1979—1980 年的增长率。中国的库兹涅茨效应在 1990—2000 年那段时间特别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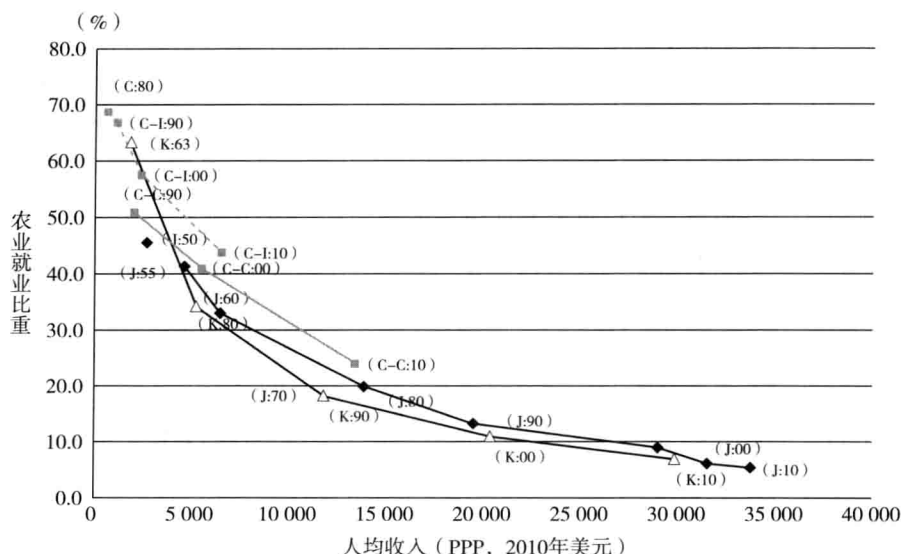


图2 中日韩三国的库茨涅茨效应的历程

注：J 为日本、K 为韩国、C 为中国。

资料来源：利用官方对部门就业和产值的省级数据，沿海省份（C-C）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内陆省份（C-I）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划分办法是根据各省人均产值与农业就业比重的相关性分析而内生决定。内蒙古属于例外，不属于任何一个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是资源大省。2010年后各省的就业数据目前尚未公布。产值数据根据IMF的购买力平价转换比折算为2000年美元

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目前可能已达到20%的临界点，内陆也处于逼近过程中，新常态下的库兹涅茨效应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的2009年居民调查数据测算出，当时仍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数约为2.11亿，而离开农村在城市部门就业的人数约为1.86亿。^①中国政府在2014年确立了一项重要政策，计划到2020年再从农村转移出1亿就业人口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的调查发现，仍在农村工作的人口约70%的年龄已达到或超过40岁。此后数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留下的人口整体年龄更为老化。所以为实现上述宏大的政策

① 参见都阳、蔡昉、屈小博、程杰，《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目标，有两个问题亟待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年龄偏大的那些劳动力的技能是否在农村之外有合适的就业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认为有此可能，因为城市就业环境需要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的互补。第二个问题是，年龄偏大的这些人是否有搬离农村的激励？我听说40岁以上的农村移民有返回户口原籍的U型回归现象。假如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普遍情况，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对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负担的忧虑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缓解上述忧虑。U型回归现象本身可能有双重影响，对城市部门的库兹涅茨效应产生消极作用，但返乡农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门生产技能可以扩散到农村及其附近区域，是反向的库兹涅茨效应。为发掘两个方向的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好处，就必须从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障、入学招生以及农村土地权利的制约。社科院的研究者测算，由此带来的“改革红利”可能给2015年的GDP增速贡献2.03个百分点，此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1.61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标实现，这个效应最后也将基本消失。他们的上述测算低于我估计的2008—2012年的库兹涅茨效应（3.11%）。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效应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都将变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韩国，特别是如果届时已引入了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农村土地改革。库兹涅茨效应是欠发达经济体在增长阶段的独特现象，无需为其最终消失而惋惜。

（2）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

图1显示了人口红利的重要影响，其定义是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给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别针对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和中国（1982年至今）的高增长时期。这些现象的出现，分别是由于各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大跃进”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婴儿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虑中国在1970年代引入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日本和韩国的人口红利下降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随着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开始更多地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的增加。然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包括学校教育、家长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训等。结果自然导致生育的子女数量减少，这个现象被人口学家和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 称为人口转型 (demographic transition)。此外, 随着生产、生活以及医学的进步, 相对于新生儿的数量来说, 曾经带来人口红利的那代人的长寿会最终导致人口红利减少, 甚至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新的趋势如今被某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或者后人口转型 (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 在东亚地区变得尤其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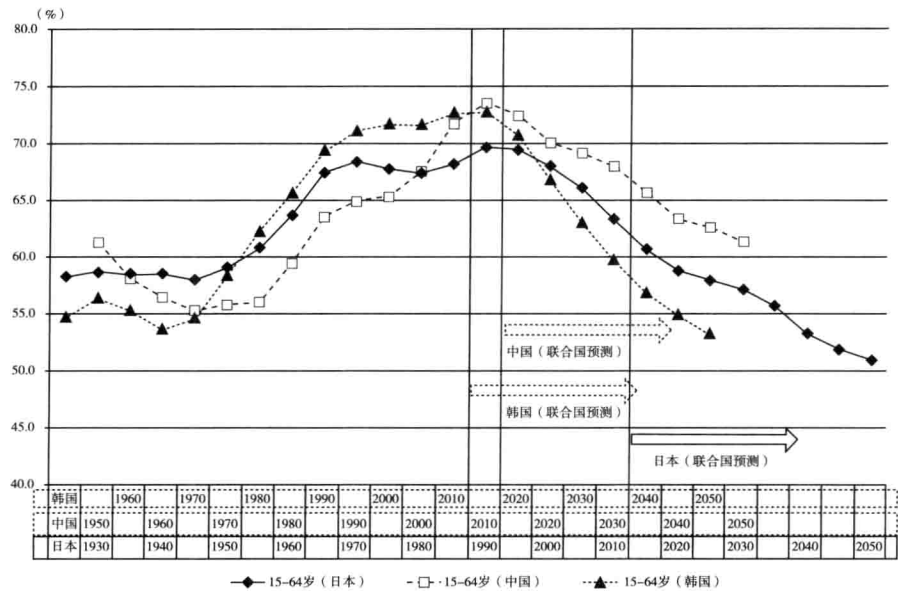


图3 中日韩三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

资料来源: 各国官方人口数据以及联合国 2012 年世界人口展望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 2012)

再看图 3, 横轴上的年份位置根据每个国家进行了调整, 使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 (日本是 1990 年, 中国是 2012 年, 韩国是 2015 年)。在此时点后, 人口红利将加速衰减。尽管存在时滞, 三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不过也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差别。中国在高增长时期之前有着更高的生育率, 在随后的时期有更高的人口红利, 在未来的短期内受负面影响的进程也较慢。然而联合国在 2012 年开展的预测所采用的总和生育率是 1.6 左右, 似乎过于乐观, 超出了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得出的 1.4 左右的官方估计值 (按某些人口学家推算甚至只有 1.2 左右)。如果把这些可能的偏差考虑进来, 负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拖累很可能更